

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

——一个工作组成员的亲身经历

张民★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K827/836

2009

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

一个工作组成员的亲身经历

张民★著

张民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一个工作组成员的亲身经历 / 张民著.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4
ISBN 978 - 7 - 5073 - 2744 - 1

I. 周… II. 张… III. 周恩来(1898 ~ 1976) — 生平事迹
IV. K827 =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9199 号

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 ——一个工作组成员的亲身经历

著 者 张 民

责任编辑 于俊道

封面设计 赵维清

出版发行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 100017

经销热线 6309701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外文印刷厂

710 × 1000mm 16 开 29 印张 376 千字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978 - 7 - 5073 - 2744 - 1

定价 58.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卷首寄语

写这本书，我犹豫了好几年。趁自己精力还可以的时候，总想着把我曾经亲身经历过的一些印象深刻的往事，根据记忆和手中日常积累的零碎资料，比较完整地记录下来。似乎有一种义务和责任感促使我必须动笔。但多次提起笔来又放下，原因是知难而退。难在那里？主要是难在对于一些比较敏感的政治问题的分寸把握上。可是思来想去，有些事，随着时间的推移，知情者已经越来越少了，从而使我更觉得史料的弥足珍贵，倘若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者由于某种原因而未完成自己该做的事情，很可能成为终身遗憾，这对历史、对社会、对读者都是一个损失。于是，我下决心知难而上，几经努力，数次易稿，终于草成此书。

四十多年前的事，虽然有些印象仍然十分深刻，但有的只记得梗概，有的则淡漠了。有些事，特别是涉及到高层政治领导人物的问题，尤其是在一些具体细节上，虽然本着尊重历史，忠于史实的原则，尽了最大地努力，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参考了大量书籍，反复求证，但仍然难免存有出入。在此，谨向广大读者朋友表示诚挚的歉意，并望予以谅解！

完稿后我发现，其中有些事确实很大，而有些事又很小。

有的看来微不足道，但我还是把它们记录下来。我一直认为，有些“小事”，一笔勾销容易，但失去后再找回来就难了。在历史废墟的瓦砾中，哪怕是一小块破碎的“陶片”，都可能会引起人们的回忆和联想，不失其应有的价值。

在这本书里，涉及到“文革”初期的一些问题。本意是研究历史经验，不再搞大“折腾”。不久前，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为了实现我们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富强民主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奋斗目标，一定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许多媒体很快就抓住这个“三不”，并且突出“不折腾”加以宣传。足见以大“折腾”为特征的“文革”这个历史教训是多么需要我们永远记取啊。

本书在写作和送审过程中，得到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同志，第二编研部副主任安建设同志，中央文献出版社编辑部主任、责任编辑于俊道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敬意和感谢！

董军同志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认真细致的具体工作。

张民

2009年1月18日



引言

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北京有个鲜为人知的机密单位，名曰“首都工作组”。它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负责保卫首都的安全。

“首都工作组”成立的背景，是毛泽东同志感到北京不安全了。这种不安全感，是由于毛泽东同志把党内高级领导干部中的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误认为是出了“修正主义”。因此，他授权周恩来同志增调警卫部队，扩大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加强警卫措施，以保证首都的安全。

为了办好这件事，在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下，成立了“首都工作组”。

“首都工作组”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其成员有：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

“首都工作组”的正副组长，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即周恩来同志为组长，邓小平、叶剑英同志为副组长。这是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同志口头传达的，我也亲耳听到周恩来同志在“首都工作组”全体会议上这么说过：如果他不在北京，这方面的工作请示邓小平。可是后来情况有了变化。由于八届十一中

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受冷落而未能参与此项工作。“首都工作组”成员万里同志也是如此，因受彭真同志连累，同时他也是北京市主要领导人之一（常务副市长），很快就被打倒，隔离审查了。

“首都工作组”下面有个办公室，它是以军委总参作战部的人员组成，开始只有六七个人，办公室主任由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兼任，副主任由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谭旌樵担任，日常工作由雷英夫主持。在他们下边，有处长左勇、参谋张志民、朱耀华和我。没过几天，朱耀华同志被调走，据说，原因是他有一位亲属受彭真株连，他又受这位亲属的株连。朱耀华同志人品高尚，踏实，能干。可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受这种穿糖葫芦式的株连，是常见的不正常社会政治现象。

最初的“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为了保密，要求短小精干，人不能多，但后来实在忙不过来，不得已又先后从总参作战部调来处长蔡洪江和5名参谋。同时又从其他单位临时借调了一些人来协助工作。“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曾一度扩大到二十多人。主要是在清理首都阶段，需要地方政府和军队有关部门参与。因此，又从总政保卫部、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等单位临时抽调了一些人来协助工作。

“首都工作组”成立后，只开过一次全体会议，它的工作主要体现在其办公室的日常活动之中。“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是“首都工作组”的常设机构。当时，从上到下，也都习惯地把“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简称为“首都工作组”。

“首都工作组”办公室虽然处在“文革”的旋涡之中，但是，它始终牢固地控制在周恩来同志的手下，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一直未能插手。周恩来同志决定抽调总参作战部的人组成“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是因为他使用这些人放心，也比较顺手。平时也是如此。我记得在“文革”前不久的一天深夜，作战部值班参谋突



然接到周恩来同志亲自打来的电话，问：现在马尼拉是几点钟？值班参谋未能立即回答。周恩来同志说，快查，马上告诉我。为此，作战部制作了一个世界时区计算圆盘，每个人发一个。还有一次，刘伯承元帅突然来电话问，老挝首都为什么叫万象？类似事情很多，这是从战争时期就养成的习惯：有什么特殊、紧要的事情，往往都是找作战部门查问或承办。实际上，许多部队首长也都有这样的习惯。

在天下大乱的“文革”中，没有世外桃源。“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成立仅三个月，主任王尚荣，副主任雷英夫、谭旌樵都受到总参“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几天之内就被打倒了。周恩来同志非常生气，但知道背后有林彪捣鬼，加之，总参内部的事他不便于直接管，不能像保陈毅同志那样去保王尚荣同志，实在无能为力。

“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一时群龙无首，只好把作战部王德副部长临时拉来顶班，但作战部那边只剩下两位副部长，工作也很紧张，几天可以，长此下去不行。周恩来同志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搬来北京军区副司令郑维山，兼管“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的领导工作。

“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于1966年5月成立，到1967年6月撤销，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完成了北京卫戍区扩编，勘察重点保卫目标，部署警卫兵力，清理首都，保护老干部，遏制混乱，组织指挥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等项任务。

当初成立“首都工作组”时，确定其任务是四个保卫，即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首都的安全。而“首都工作组”在实际运行中，它所执行的任务，很快就发生了异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把“保卫‘文化大革命’”，异化为“保护老干部”。那个时候，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操纵造反派打倒老干部，而“首都工作组”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千方百计地保护老干部，使他们免受和少受造反派揪斗。林彪、

江青等人制造混乱，鼓动造反派大搞打、砸、抢、抄、抓，而“首都工作组”在周恩来同志的领下，则是千方百计地遏制混乱，阻止造反派胡作非为。可以说，“首都工作组”的许多举动，是与“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任务相违拗的。

由于“首都工作组”任务特殊，周恩来同志要求严格保密，其保密之严格难以想象，他甚至在茶炉房里召开会议。加之“文革”斗争激烈，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出现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离奇现象。

“首都工作组”的事，仅仅是周恩来同志工作的一小部分。在“文革”中，周恩来同志肩负着党和国家的重要使命，肩负着七亿人民的重托。“文革”一开始，周恩来同志的工作量成倍地增加，他肩上的担子越来越沉重。除党、政、军各方面的日常工作外，做好“红卫兵”、“造反派”的工作，处理危机事件，挽救险情，遏制混乱，扭转局势，常常使他陷入应接不暇、紧张劳累的旋涡。

周恩来同志原本是精力充沛的人，经常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也不显得疲倦。然而，“文革”开始后仅半年时间，他就感到身心疲惫，力不从心，以致因劳累过度而引发心脏病。他面对“造反派”的纠缠，曾经多次表示身体难以支持，感到时间不够用，许多因混乱严重影响生产的地方，想去现场查看，而没有时间去。1967年5月11日，还差五天，在“文革”满一周年之际，周恩来同志在接见外事口造反派代表时说：“你们看看，我这样的身体，这一年就成了这个样子，你们总得要让我为革命多做一些工作嘛！”

一个月后，周恩来同志在接见农业系统造反派时，他又说：“我身体这样不好，一天工作这么长时间，哪能受得了啊！现在我就是没躺倒，我希望不要躺倒。”

过去在战争年代，无论是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反“围剿”，长征途中紧张激烈的战斗，还是八年抗日战争的艰苦奋斗，解放



战争时期转战陕北的艰难时刻，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无论多么忙碌劳累，周恩来同志始终都没有说过一个“累”字。可是，“文革”仅仅一年的光景，就使他不得不承认“难以应付”。要知道，按周恩来同志的坚强性格，不到万不得已时，他是不会说累的。

“文化大革命”对于周恩来同志而言，是突然的，他没有思想准备，和许多人一样，是被动地卷入这场狂风恶浪之中，他曾经多次说过：“说老实话，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大局面。”^①

但是，在政治上反应敏锐的周恩来同志，对局势的发展，很快就有了清醒的认识。他在一次会议上指出：“目前形势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拦。我们必须因势利导，堵、挡，这些办法都不行。”

“文革”开始后，周恩来同志首先遇到三个大问题：一个是如何保护老干部；一个是应付红卫兵、造反派和组织全国一千多万红卫兵见毛泽东主席；一个是在全国混乱状态下，如何抓好工业、矿业、交通企业的生产和国家的经济建设。

林彪、江青等人，利用“文革”的混乱局面，阴谋篡党夺权，为了实现他们的野心，首要的一招，就是打倒大批党政军机关高级领导人。因此，保护领导干部还是打倒领导干部是当时极为尖锐的斗争焦点。

按当时权力分配布局，林彪、江青集团处于有利地位。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名次排序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其中邓小平、刘少奇同志在十一中全会后就已经失去实权，朱德、陈云同志不参加日常工作。剩下的

^①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84页。

七名常委，属于林彪、江青集团的有陈伯达、康生，这两个人都在“中央文革小组”，他们在中央高层日常工作中，既有发言权，而且也很便于他们施加各种影响。

同林彪、江青集团相对立的，有周恩来、陶铸、李富春同志。但陶铸同志是“文革”开始后刚调来中央的，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仅工作了五个多月就被打倒了。李富春同志在“二月抗争”后，实权也受到很大削弱。这时，在中央高层领导中，真正能发挥领导作用的，只有周恩来同志一个人了。

这种状态，对林彪、江青集团有利。林彪、江青集团也正是利用这种有利地位，大搞阴谋诡计，打击、陷害周恩来同志。

在“文革”中，无论毛泽东同志起初如何重用林彪，如何相信江青，但他对周恩来同志也还是信任的，尽管有时他不同意周恩来同志的一些意见或做法，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基本上都是相信和重用周恩来同志的。

毛泽东同志是一位具有高超领导艺术的领袖。他吸取古今中外历史经验，在权力问题上，他是大权独揽。他过去常说“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因此，他从来不把权力过多地集中在某一个人身上。晚年的毛泽东同志，虽然在一些重大事情上一错再错：他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他错误的器重林彪，并选择他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他错误的相信江青，让她出来从政，把“中央文革小组”的大权交给她。但同时，他在党内权力的分配上，却保持了清醒、冷静的头脑。他不把过多的权力交给林彪和江青这两个人，而是让周恩来同志掌握比较多的权力。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上，周恩来同志和“文革”前一样，仍然处在三把手的重要位置，毛泽东同志委托他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周恩来同志仍然是国务院总理，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协助毛泽东同志处理党、军队和国家的财政、经贸和外交工作。在军队领导权方面，



毛泽东同志始终把它紧紧地抓在自己手中，同时他让周恩来同志掌握一定程度的军事权力，并没有把军权都交给林彪。

在这个大背景下，周恩来同志灵活巧妙地运用他的地位和权力，尽最大努力保护他所能保护的人。

有一次，周恩来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一些造反派的头头们时说：“你们要揪斗的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都是处在我们党和政府的第一线，都是在毛主席身边做实际工作的人，每天都有党和国家的大事需要他们参与。”他又说：“不但谭震林、李富春等副总理不能揪，刘少奇、邓小平也不能揪，陶铸也不能揪，把毛主席身边的人都揪了，如何保卫党中央？刘、邓、陶是中央常委，我还得保。”^①

从周恩来同志的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得出来，他对老干部的保护，既有多年革命同志的感情，但更多的是出于公心，出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

周恩来同志在保护党和政府领导干部的同时，他也尽最大努力保护民主人士、少数民族领袖、劳动模范代表人物和有贡献的科技人员。总之，能保的他都尽力地保，使这些人免受或少受红卫兵的冲击。

周恩来同志不仅保护了许多老干部，而且他对这些受打击、挨批斗、被禁锢、遭冷遇的老干部，从多方面在生活上给予力所能及的关心照料，并且尽可能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在精神上，给予无微不至的体贴和安慰。国务院大部分部级领导干部被造反派轮番揪斗，为了使这些干部能得到起码的休息，周恩来同志先后安排三十多位部长到中南海住宿，这些年大体弱的部长同志们，白天到本单位挨斗，晚上住进中南海，周恩来同志一再叮嘱工作人员，照顾好他们的生活，派医生给他们检查

^①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109、110页。

身体，送药治疗。有些事看起来“不大”，却反映了周恩来同志在保护老干部问题上的真情实意，这真是既保又护啊！

在“文革”中，周恩来同志需要经常开列一些这样那样的名单，他在开列名单时做了许多文章，蕴含着保护和关爱老干部的良苦用心。如，在1967年的八一建军节前夕，周恩来同志按惯例，开了一个包括各位元帅出席招待会的名单。但是却遭到林彪、江青等人的反对，他们以所谓“二月逆流”和打压军队造反派为借口，不同意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同志出席招待会。周恩来同志据理力争，报请毛泽东主席同意后，这几位元帅终于按时出席了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又如，在毛泽东同志多次接见红卫兵过程中，尤其是最后几次，随着打倒刘少奇、邓小平、贺龙同志的浪潮进一步升高，他们出现在群众场合已经很困难了。但周恩来同志作为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总指挥，每次他都把这几位老同志开列在陪同接见的名单之中，经毛泽东同志批准后，请他们一起上天安门，一起乘车检阅红卫兵。尽管林彪、江青等人嘟嘟囔囔表示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仅从开列名单本身而言，不算什么大事。但这在当时来说，却是一件很有政治意义和精神情感的大事。

这一桩桩一件件往事，那确实是“细微之处见真情”啊！

“文革”开始以后，在全国掀起了“红卫兵”造反的狂涛。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到处横冲直闯，在所谓“造反有理”的口号煽动下，从破“四旧”开始，把社会上许多他们看着不顺眼的东西，都当作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一起破掉。

从破“四旧”发展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揪斗老干部、抄家、抓人。很快全国就陷入了打、砸、抢、抄、抓的一片混乱之中。

对于这种“天下大乱”的状态，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极力鼓吹煽动，背后指使操纵，他们要的是越乱越好，以便于乱中篡党夺权。



毛泽东同志对于这种混乱状态是反对的。但是他又认为这是“乱了敌人”，“大乱才能大治”。

作为共和国的总理周恩来，对于这种混乱局面则忧心如焚，他不能容忍新中国建立17年来形成的良好社会风尚和道德标准被彻底破坏。一方面，他制定政策，对红卫兵说服教育，制止混乱；另一方面，他采取各种应急措施，亲自处理各种突发事件。然而，阻力很大。对眼前发生的许多事件他无可奈何。

“文革”中，江青、陈伯达一伙给周恩来同志扣了许多“帽子”，什么“和稀泥”、“折中主义”、“最大的保皇派”、“大老保”呀！什么“救火队长”、“以生产压革命”、“唯生产力论”、“唯武器论者”呀！等等。对此，周恩来同志不屑一顾。江青一伙给周恩来同志乱扣帽子，别有用心，完全是一种政治攻击，诬蔑陷害。

然而，在我看来，倘若换个视角分析，在这些帽子中，有两个却可以说是扣得挺“合适”的。一个是“救火队长”，另一个是“大老保”。“救”与“保”是联系在一起的，救中有保，要保必救。

多年来，反复琢磨，我最欣赏的是“救火队长”这个帽子。

那个时候，天下大乱，“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一伙人，煽动红卫兵、造反派到处“放火”。

谁去救火？有的人想救，不敢救；有的人想救，力不从心。至于少数幸灾乐祸者，就不用说了。只有周恩来同志，挺身而出，担当起“救火队长”的重任，他今天这里救这个火，明天那里救那个火。像我们这些“首都工作组”的工作人员，当然还有北京卫戍区的几万官兵，国务院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周恩来同志的秘书、联络员等等，都可以算是“周队长”的“救火队员”了。

尽管红卫兵们到处“放火”，但是周恩来同志却不是一味地

指责他们，而是正面劝说，讲道理，教育他们不要犯错误，要讲政策，教育他们要学习解放军。周恩来同志心里明白，红卫兵搞打、砸、抢、抄、抓，不能把错误和责任一股脑儿地都推到他们身上。这些红卫兵，大部分是十几岁的孩子，是未成年人，“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错误现象，不能由十几岁的娃娃们来承担。

周恩来同志十分关心和爱护红卫兵。他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连续组织了八次由毛泽东同志接见从全国各地来的一千多万红卫兵，每次他都是精心组织指挥，做好安全工作。周恩来同志把外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当客人招待，尽可能满足他们渴望见到毛泽东主席的心愿。他像个亲人长辈一样，关心、照料这些红卫兵的生活。因来京的红卫兵很多，房子不够住，有许多人住在仓库、地下室，周恩来同志亲自安排几千红卫兵住进中南海由工作人员腾出来的房舍。有时周恩来同志在外面工作一夜，凌晨回到中南海，回家休息之前，他还要到红卫兵住的房子里去查看这些娃娃们睡得怎么样，被子是否盖好了，生怕他们受凉感冒。一晃40年过去了，当年这些红卫兵都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当他们回忆起这段往事，该做何感想呢？

红卫兵大串联后，特别是造反派夺权后，最突出的问题，是对生产建设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轻工业、重工业、交通运输等各项生产指标全面跌落。对此，周恩来同志忧心忡忡，在他的工作日程安排上，几乎没有一天不谈生产的。

周恩来同志是最早提出“抓革命，促生产”这个口号的。1966年9月7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同志指示，发表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要求各生产单位和业务部门加强领导，广大工人、社员和科技人员及其他劳动者，应当坚守生产岗位，做到革命和生产两不误。

或许有人会说，“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早在8月中旬中央就提出来了。不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写进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内容,但其着重点却是放在“抓革命”上面,它强调:“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很明显,这是脱离实际的官样文章(据说这个“十六条”是陈伯达主持起草的),以致后来被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关锋、姚文元等“文革”大员们引申、篡改为“革命抓好了,生产自然会好”的谬论。

对此,周恩来同志多次予以反驳,他说:“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上去。”周恩来同志强调指出,“生产要实际去抓,去干,要组织专门抓生产的班子,一线工人不能脱离生产岗位”,“不能停产闹革命,不能影响生产”。“千言万语一句话,就是一方面要闹革命,一方面要抓生产、促生产,不要妨碍生产。”为此,周恩来同志召集工交战线的领导同志开座谈会,提出:“要组织生产班子,把懂得生产的人、生产积极分子,老工人都吸收过来,把生产搞好。”^①

周恩来同志批评那些不坚守生产岗位、到外地串联的人,是“跑革命、丢生产,是假革命。”

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陈伯达、康生、王力等人,对周恩来同志积极抓生产,不仅不予支持,反而加以歪曲、攻击。在一次关于工业、矿业、交通企业“文化革命”的汇报会上,“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当着周恩来同志的面指责说:“对于文化大革命,我们中央有的人就是主张压,9月上旬就压,用‘抓革命,促生产’这么一个口号,还嫌压得不够,后来又来了一个《再论抓革命、促生产》,一压再压。”

^①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100页。

更使周恩来同志窝心的是，作为“副统帅”的林彪，也当面对他加以指责。林彪阴沉着脸说：“工、交座谈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整个工、交企业要彻底把方向来个转变，如果我们完全从生产收获的多少，来论文化革命的成败，那是大错特错！”^①

抓生产咋就错了呢？面对这些无理指责，周恩来同志十分无奈，他只能自受委屈。

“文革”过后，有些挨过整的老干部，提起周恩来同志，他们都很钦佩，对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表示敬意。但同时，又多少有些埋怨情绪，认为周恩来同志有点“软”，没有顶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老干部的迫害。甚至到现在，说起这些往事，有的老同志还在摇头。抱此成见者，往往是从个人受迫害的角度片面观察历史，而不是全面了解历史的整个过程。

周恩来同志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很有分量的硬话：“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说话，否则，我就要犯罪。”

其实，从“文革”一开始，周恩来同志就没有软过，他一直在抗争，从起草《十六条》，到“大闹怀仁堂”，周恩来同志一直是党内抗争力量的核心和灵魂。那时，尽管有强势的林彪、江青集团的邪恶势力，他们掌握着“文革”大权，但毕竟不能一手遮天。从1966年8月到1967年2月，在半年内，接连不断地发生了多次较大的抗争（其中包括一些红卫兵、革命干部和群众的抗争），虽然有的抗争被压下去了，但作为显示一种力量的存在，却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

在“文革”中，周恩来同志被林彪、江青集团攻击、陷害，他们明枪暗箭，煽动和利用“造反派”，操纵宣传舆论工具，千

^①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99页。